



从东方到西方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 孟长勇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9-06028-7



9 787309 060287 >

定价：22.00元

10-03/22

2007



从东方到西方

——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 孟长勇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东方到西方——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 孟长勇
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309-06028-7

I. 从… II. 孟… III. 文学—文化交流—研究—中国、外国—20 世纪 IV. I1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5140 号

从东方到西方——20 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孟长勇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黄文杰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49 千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028 - 7 / I · 433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一种开放豁达的心态，一种穿越世界的眼光，对中外文学进行比较，在中外文学的形式之异与精神联系上，评价两者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互动的途径及融通的结果；以“五四”时外国文化思潮解构古典、重建新文化为开端，历数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观念、理论，阐释著名作家作品，分析现代小说、诗歌的产生与发展，强调中国20世纪主流文学的连贯性、继承性，及其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某些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找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能的启示与借鉴。

目 录

第一编 中外文学比较

《屈原》与《李尔王》美学品格比较	3
论延安文艺对外国文学的借鉴	19
中国文学在日本、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影响	33
用异国音符唱故乡之歌 ——中亚东干族文学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49

第二编 20 世纪中国文学

双壁互照辉相异 ——鲁迅与瞿秋白杂文风格比析	65
挣断精神的罗网 ——论祥林嫂的反抗性	74
论瞿秋白的文学党性原则理论	81
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观	103
20 世纪前期现代小说发展述略	112
论延安文艺的开放精神	134
琅琅诗声激延水 ——公木延安时期的诗歌创作	144
从民间到“圣坛” ——《东方红》诞生的前前后后	163
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	172
暴露·反思·进取 ——新时期开拓阶段小说述评	183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	232
面对群山唤巨灵	
——评长篇传记文学《群山》	244
试论机智人物的喜剧特征	255

第三编 外国文学

薄伽丘喜剧意识与《十日谈》艺术表现	269
《十日谈》：一面高扬人性的大纛	282
看似平淡实奇崛	
——读维克多利亞·瓦尔坦的一组小说	293

后 记	303
-----------	-----

第一编

中 外 文 学 比 较

《屈原》与《李尔王》美学品格比较

1942年1月,郭沫若以“历来所未有”^①的泉涌妙思,著成他成就最高的史剧《屈原》。1605年,莎士比亚饱蘸忧愤,写成他著名的悲剧《李尔王》。由于两部剧都取材于古代,都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都属于悲剧性的诗剧,尤其剧中的主人公,都有非常相似的长篇抒情独白,所以,有人在《屈原》一公演时就说,《屈原》很像《李尔王》。

郭沫若自己也曾谈到:《屈原》与《李尔王》“相似得令我自己都感觉着有点惊讶”。但他也深自庆幸,在写《屈原》之前,不曾读过《李尔王》。倒是“三十年前读过兰姆的《莎翁本事》(林纾译《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向暴风雨愤怒的一段大概也是有的吧”^②。郭沫若于此承认了两个剧的相似之处。然而,却绝不是有意识模仿《李尔王》,毕竟他读过的只是兰姆改写的故事而非原剧。当然,即使如此,他也对故事感受到“无上的兴趣”,无形间给他以“很大的影响”^③,强烈触发了他的艺术兴奋点。因此,三十年后,还能在一种不自觉状况下唤醒内心世界深藏的积累,以接近的形式喷吐迥然相异的情愫。

在比较文学领域,有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方面来比较

① 《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见《郭沫若选集》第3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屈原〉与〈李尔王〉》,见《郭沫若选集》第3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里要指出的是,郭沫若谈的《莎翁本事》为英译本,是兰姆据莎翁戏改写的二十则故事。后来林纾与魏易将此译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参看戈宝权:《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载《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我的童年》,《沫若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4页。

分析《屈原》与《李尔王》，通过比较寻觅两者的相似乃至相同。但这种比较，充其量只看到郭沫若怎样向莎士比亚学习，却看不到郭沫若比莎士比亚高明之所在。笔者以为，既然是比较不同时代、国家、民族及不同风格作家的作品，由于各自社会经历、历史传统、人文背景、地理环境以及审美心理结构不同，所以，即使相似或相同处再多，也是同中有异、形同神异。因此，本文拟从作品整体的美学品格上比较《屈原》与《李尔王》，比较其同中之异甚至两者的高下来。

—

一部优秀的作品，其美学价值往往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包容的思想内涵、负载的历史或现实性的命题，以及为完成主旨进行艺术构思时的总体精神。

历史剧《屈原》(1942)，诞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暴虐黑暗的年代。日寇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举国上下，激愤难抑。郭沫若把“这个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的时代里去”^①，为人民奋笔疾书，写下了中国戏剧史上光华灿烂的不朽诗篇——《屈原》。剧作反映了当时国统区的时代风暴和社会黑暗，极力彰扬正义，鞭笞邪恶，塑造了一个时代性的悲剧主人公形象——屈原。

悲剧《李尔王》(1605)产生在资本积累的“羊吃人”时代(资产阶级为做羊毛生意，圈地养羊，把农民逐出田园，使其饥寒交迫，由流亡而至暴动)。《李尔王》真实地揭露了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贪婪、残酷。和《屈原》一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时代的风暴情绪，也力图伸张正义、控诉邪恶，同样塑造了一个悲剧性主人公形象——李尔王。

① 《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见《郭沫若选集》第3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可以看出,《屈原》和《李尔王》在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时代呼声、塑造悲剧性主人公、张扬正义、鞭挞邪恶方面是颇为相似的。不仅如此,两剧在完成主题而进行艺术构思的总精神上也是相同的,即借古喻今,通过历史事件和人物,表现和影射当时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借古喻今时,不拘泥于古事,认为“历史的事实并不一定是真实”^①,而要“失事求似”^②,在把握历史总精神的前提下,对史实予以合乎情理的重新阐发,对人物性格予以“合理的发展”^③,甚至还虚构些人物与情节出来。

《李尔王》根据同名旧剧改写。在旧剧中既没有葛罗斯特和他两个儿子的故事线索,又没有李尔王暴风雨控诉的情节。在贺林希德主编的《英格兰编年史》卷二中,李尔王复国后还统治了两年,死后考狄利亚又统治了五年。然而,为了写出时代的悲剧性这历史的精神,莎士比亚就重新阐发李尔王的命运,改其个人历史为悲剧结局。同时,虚构了暴风雨场景,突出对社会之黑暗的否定。虚构进爱德蒙形象,加强对现实中唯利是图、利己主义人际关系的暴露。

史剧《屈原》取材于战国历史。不过,屈原被南后诬陷、怒斥张仪及其“雷电颂”诗等,都不是历史上曾有的事。但这些虚构有助于突出主人公屈原的坚毅性格和崇高气质,合乎历史总的精神。历史上的宋玉,是对辞赋发展有贡献的作家,剧中把他写成“没有骨气的无耻的文人”;张仪是对中国统一有功的人,剧中有意把他写得相当坏;婬媚史无其人,为了发展屈原,作者虚构她做屈原精神的女儿。这些重新阐发或虚构都是对历史精神的合理发展。很明显,在为反映主题而进行艺术构思时,《屈原》和

① 《我怎样写〈棠棣之花〉》,见《沫若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68页。

② 《历史·史剧·现实》,见《沫若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

③ 《献给现实的蟠桃》,见《沫若文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

《李尔王》都把握了不拘旧有、以失事求相似的原则，达到了为完成主旨进而为现实服务的目的。

尽管在主题思想以及艺术构思基本精神的大方面，两剧颇为相似，但再具体一些考察，则可发现相同之中有差异，两者还往往是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迥然有别。

《屈原》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去把握历史精神，揭露抗战时期国民党丧权辱国的罪行，反对分裂、主张团结、抨击黑暗、歌颂光明，表现了屈原自始至终爱祖国、爱人民、坚定不移为实现崇高政治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品质。而《李尔王》是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把握历史精神，揭露资本主义人情浇薄，反对非人道的背叛，主张人道的“和谐”，暴露以金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人际关系。通过李尔的转变过程完成了作者希望的道德完善，表现出唯有君王“人性复苏”，社会才会国泰民安。两剧相比，一个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反映现实；另一个以人文主义思想感受现实。一个站在政治的高度，爱祖国、爱人民，呼出民族的心声；另一个立足伦理的层次，爱自己、爱父亲，评判道德伦理的是非；一个抨击黑暗，歌颂光明，要在彻底毁灭邪恶的同时求得新生命的诞生；另一个诅咒现实，却在对社会的小否定中求大继承。两相比较，主题的起点自然是《屈原》高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李尔王》中有着作者因思想和时代的局限而摆脱不了的宿命色彩、天命观（如五幕二场中爱德伽说：“人们的生死都不是可以勉强求到的，你应该耐心忍受天命的安排”）；而《屈原》则充满着积极战斗、乐观自信的进取精神（屈原向往光明，与恶势力斗争不屈，“脚镣手铐我并不感觉痛苦”，“倒反而增加了我的力量”）。《李尔王》局限于个人的恩怨情仇，伸的是一己之正义，控诉的是与自己为敌的邪恶；《屈原》则拥有民族的开阔视野，张的是爱祖国的凛然正气，抨击的是祸国殃民的丑类。《李尔王》以人文主义的“爱”为内容写李尔王对自己的爱，考狄利亚对父亲的爱，属于一种狭隘的“情爱”，最多也才写到道德完善了的李尔同情人民；而《屈原》写主人公对祖国、对人

民的爱,婬娟对民族以及民族精神的化身——屈原的爱,属于有广泛意义的“仁爱”,它具有一己之“情爱”所不可企及的博大和无私。很显然,《屈原》比《李尔王》思想要进步,内涵要深广,境界要开阔。

二

《屈原》和《李尔王》都是悲剧,悲剧的美学倾向必然包含悲剧所呈现的意义。从悲剧意义上讲,两剧也表现出了相同中的许多不同。

《屈原》和《李尔王》都显示了主人公所处社会的腐败、衰弱,显示了现实崎岖使自己的意志、愿望不能实现,显示了丑恶势力的横行、猖獗,正面力量的暂时失败。在两剧中,有价值的被毁灭了,屈原遭贬谪流亡,婬娟牺牲,李尔死灭,考狄利亚为父殉情,他们所面临的邪恶势力实在太强大,两剧的悲剧意义在于都表现出了悲剧的时代性。

不同的是,《李尔王》的悲剧意义,在表现了一定的悲剧时代性的同时,还表现出一些性格上的悲剧性。主人公李尔,其悲剧命运在相当程度上与他的刚愎自用、横蛮暴戾、糊涂愚蠢的性格弱点分不开。而屈原,自始至终刚正不阿、坚贞不渝,他的悲剧性不在于他的性格有什么缺陷,而完全在于所处的时代。

显示《李尔王》悲剧美学意义的还有考狄利亚的为“情爱”而死。考狄利亚实而不华,对父亲有着真挚的“情爱”,然而她的“情爱”由于两个姐姐唯利是图巧取宠、父亲喜好恭维不重实而不得实现。这就构成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她的“情爱”代表着普遍的“人”的要求,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美的价值。她的为父殉情自然就作为美的毁灭面显示悲剧意义。这里,她的“情爱”属于个体的、一般人的普通层次。她的死,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同情、怜悯、惋惜。而屈原,并不是一般怀才不遇的文人,他是一个与国家、人民共忧患,有远大抱负及理想的诗人兼政治

家。他崇正义，尚真理，坚持抗暴以卫祖国。他像坚强而圣洁的柱石，为了国家的存亡，头顶黑暗的重压，呼唤着光明和胜利。然而，他被淫威压败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不仅是楚国的悲剧，而且是我们民族的悲剧！”^①他的悲痛和愤怒，倒不是因他的人格受辱，而是因理想受辱，是他所代表的爱国力量的失败以及由此导致民族灾难所引起的。这种情感属于那个时代具有共同政治立场的人们所共有，而非仅仅他一个人的。这情感摆脱个体，代表整体，因而具有时代的气度、崇高的品格。其崇高，就在于将小我化进大我，将个体融进整体的“无私”，由此而产生的博大，使生命获得了永恒性。屈原以及婞婞，有着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有着明确的英雄主义的生命价值观。他们认为，能为整体利益而败而亡，正是个体的荣幸和永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他们命运的失败或死亡绝少怜悯和哀伤，多感壮烈和崇高。把个体的生命换作有价值的整体利益的存在，那是英雄的壮举、正义的胜利、崇高美的完成。而这，正是《屈原》在悲剧意义上高出《李尔王》的地方。

三

戏剧非常讲究人物。剧中人物怎样行动，决定着情节怎样发展。而悲剧中的人物性格，往往关系着悲剧的整体品格。也就是说，《屈原》中的屈原、婞婞，《李尔王》中的李尔、考狄利亚，他们各自性格的建树和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就显示着作品的美学意义。

屈原被贬谪流放，婞婞饮毒酒就义；李尔疯狂致死，考狄利亚被缢身亡。他们都是忠良，而命运却都是悲剧。就命运的形式而言他们是相同的，但就人物性格的起点、所达到的高度、性

① 《论古代文学》，见《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格层次的丰富性看,两剧就大不相同了。

屈原是人民意志的代表、民族精神的化身。剧中性格虽有一些发展,但无大的质的变化,从始到终馨香、净朗、崇高、壮美,闪耀着夺目的光彩。而李尔王开始暴戾骄横、刚愎自用,让人感到憎恶,后来生活的变故使其人性复苏,良知发现,对人民有了体恤之心,这才让人感到怜悯和同情。可见屈原性格比李尔性格的起点要高些。就思想水准而论,屈原始终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整个民族说话,甚至到最后,其反抗精神突破忠君思想的局限,成为一个反君权、反神权的叛逆者,其思想达到了进步民主主义的高度。而李尔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据一己之好恶,随便把社稷交付别人,直到最后也才稍微同情人民,有了人文主义的色彩,其思想充其量只能达到人文主义化的个人主义。还有,婵娟是响当当的屈原精神的女儿,继承了一种为国为民而献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传统。“我爱祖国,我就不能不爱先生。”显然,她对屈原的爱,除去个人伦理的色彩,主要蕴含着深刻的爱国主义的内容。而考狄利亚只能算作李尔血缘上的女儿,她继承的是人伦长幼的传统,她对李尔的爱,完全基于报答养育之恩,属于个人伦理的范畴。比起婵娟来,她思想性格的起点、达到的高度都要明显地低一筹了。

人物性格在抒情性很强的作品里,常常由人物感情来体现。所以,《屈原》和《李尔王》这两个同属浪漫主义、都重情感表达的悲剧,性格层次丰富与否,从情感层次上也完全可以看出。屈原与婵娟的感情,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而这“仁爱”起码具备三个以上的层次:伦理道德层次(长幼、主仆、师生之爱);思想认识层次(正义、真理之爱);社会政治层次(祖国、民族之爱)。这三个层次的融合和浑然一体,使他们的感情显得厚实和丰富。而李尔与考狄利亚之间的情感,只能用“亲情”概括。这“亲情”基本上只到伦理的层次(长幼之爱),至于思想层次(真理、正义之爱)几乎达不到。所以,他们的感情层次显得不够丰富,不够高。如果再从情感类别、性质上看,屈原和李尔更不相同。屈原有纯

洁、高尚、庄严、正直、耿介、悲愤、崇高等情感，而李尔只有专横、骄奢、自负、哀伤、怨恨、失意等情感。屈原和李尔同样被逼得一度精神变态，然而屈原是將到真狂的临界而努力支撑着建设自己，李尔却是处于疯癫中一味诅咒别人、与恶同尽。

除了主要从情感考察外，人物身份所体现的性情的丰富程度也大不相同。屈原显然有至贞的秉性、圣洁的人格、渊博的学识、坚定的主张以及崇高的抱负和理想，集进步政治家、诗人、思想家的素质于一身。而李尔仅仅是一个失却了王位的国王而已，除了一己的私利、人文主义化的个人要求外，余者又为何物呢？

四

人们谈及《屈原》和《李尔王》，最多提及也是感到最明显相似的地方，是两剧都有刺激性很强的长篇抒情独白——风雨雷电场景中的抒愤。两者同样是因环境压迫而形成感情的巨大冲动。“同样的是临到了要发狂的境界，同样的以自然元素拟人而向之发泄愤懑；同样在怨天恨人、骂神骂鬼。”^①同样语式和气势的独白，同样场面和气氛的抒情，又是同样以外在自然界的风暴衬托主人公内心的风暴。这些艺术表现的形式像极了。然而，从表述的内容、抒情的意境、激愤的性质和强弱上来考察，则就大不相同了。

李尔的激愤，是他听不进逆耳忠言，终被两个女儿逼得走投无路，于是向风雨雷电发出的求救的信号。屈原的愤怒，是因坚持爱国而受冤，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发出的挟雷霆电般正义的吼声。

试听屈原之声：“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里暗中

^① 《〈屈原〉与〈厘雅王〉》，见《郭沫若选集》第3卷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